

先總統 蔣公早年對蘇俄及共產主義的認識

李 國 祁

一、前 言

國父中山先生的聯俄容共，誠如今日中外史家所了解，其目的在防患與借援。所謂防患，是指防俄與防共，亦即防止外蒙古為蘇俄併吞，防止蘇俄與軍閥——特別是吳佩孚、陳炯明——的勾結（註一），以及防止由蘇俄扶植的中國共產主義勢力快速擴張（註二）。所謂借援，是指借取蘇俄革命與反帝國主義的經驗，以及蘇俄實力的援助（註三）。而蘇俄及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的目的並非如此，是希冀借此寄生國民黨，滲透國民黨，分化國民黨，俾迅速壯大自己，赤化整個中國。故蘇俄在其「中國南部蘇聯軍事政治工作組織大綱」中，標明宗旨在：「使共產主義及蘇聯國家得一般中國人民之同情，並極力使彼等接近蘇聯，得蘇聯之援助，使在軍隊中及民間組織工人團體，預備作將來之革命運動。」（註四）孫中山先生對此亦有了解，故於民國十二年元月與越飛（Adolf A. Joffe）發表聯合聲明時，特別表明：「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為中國並無可使此項共產主義或蘇維埃制度實施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註五）。」同時於容共條件中規定，共黨份子僅可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必須嚴守國民黨黨綱黨紀。而國民黨員絕不可參加其他政黨。此外亦於三民主義民生主義中，駁斥馬克斯階級鬥爭與社會進化的理論，認為是倒果爲因，僅是社會病理家，而非社會生理家。主張社會的進化在民生，人類社會之所以能長存與不斷進步，在人與人間的互助合作，絕非由於階級鬥爭（註六）。由於孫先生個人的威望與嚴加防範，故終孫先生之世，蘇俄與中共究不敢明目張膽的大肆活動。但國民黨人中，已有不少重要幹部對此隱憂不已，蔣中正先生即為

其中之一。故本文以此爲題，討論蔣先生早年對蘇俄及共產主義的認識，及其堅決反共觀念的形成。

在資料方面，由於蔣先生民十二年訪俄報告久已散失，而俄人於一九六九年却間接發佈部份資料，德學者 Dieter Heinzig 所著國民黨的蘇俄軍事顧問，一九二三—一九二七 (Sowjetische Militärberater bei Kuomintang 1923-1927, Baden-Baden, 1978) 一書所載，並參以去年吳文津陸培湧及王聿均諸人在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討論會中所發表之論文，與其他中文資料來加以討論，俾能勾畫出蔣先生訪俄活動的整個全貌，以厘清過去對此段歷史的不了解與誤會。

一、民國初年對俄國的認識

蔣先生爲一民族主義者，少年以後即留心列強的對我侵略。根據今日留存的蔣先生著作，氏於民元年所創辦的軍聲雜誌發刊詞中，即曾稱：

「巴拿馬運河開，而東西之海防益加設備，亞伯里亞鐵路通，而歐亞之陸防愈嚴其守禦。各國抱殖民政策，而以權利爲主體，以遣使爲間牒，以貿易爲先鋒，以兵力爲後盾，二十世紀以後，太平洋沿岸將成爲各地馳騁角逐之場。若英若美若俄三雄鼎峙，旗鼓相當。法人懷蹴踏全球之想，對於亞洲大陸，風馳電掣，捷足爭先。德國則野心勃勃，飛揚跋扈，又有睥睨一世之慨。十年以來亞東三島，所謂武士道大和魂者，挾其短小精悍之技倆，急取直追，驟驟乎竟欲奪世界諸大帝國之座席。試橫覽泰東禍機之萌，急於眉睫。介居其間者，欲圖保國，不思所以防禦之，弱之肉，而強之食，覆亡之患，其能免乎？」（註七）

可知是視俄國爲世界主要帝國主義者，而太平洋沿岸是其馳騁角逐的重要場所之一。

在該雜誌中，蔣先生先後發表：征蒙作戰芻議、革命戰後軍政之經營、蒙藏問題之根本解決及巴爾幹戰局影響於中國與列國之外交四文。在征蒙作戰芻議一文中，蔣先生自稱：「征蒙爲討俄之代名詞」，「征蒙爲從，討俄爲主。」他說：

「征蒙無所謂作戰，亦無所謂計畫，何待記者焦思熟慮，勞心苦神，而爲此喋喋哉！無如今日之征蒙，非征此冥頑不靈，強硬無忌之活佛，乃征其主動嗾使慾意播弄之雄視全球，睥睨世界，擁數百萬重軍，據千二百萬方哩廣

士，聲靈赫濯，威名鼎盛之後援俄羅斯耳。故本問題所研究者，亦以征蒙爲從，討俄爲主。此非特記者個人作如是觀，凡各報之論文，國民之心理，亦無不作如是想耳。」（註八）

文中蔣先生除詳細比較中俄兩國兵力，及俄人對亞伯利亞之經營外，並認爲國人萬不可因俄敗於日，以爲可輕而易舉勝俄。蓋我國較俄更弱。故中俄之戰取決於外交，而外交之首務當先取決於南滿問題之若何解決。主張於開戰前，運用敏捷的外交手段，趁近東多事之秋，與暴俄利害相反之英德意奧諸國聯絡，再與先進共和國美法相互締交，甚至可在南滿方面，對日讓步，然後併力北向，銳意攻俄（註九）。

在革命戰後軍政之經營一文中，蔣先生首先言及我國革命戰後之國防，理論上應海陸並主，難於偏重。唯事實上西北尤較急於東南，故經營陸軍亦當較重於海軍。而西北國防又可分爲東北部、北部及西部，其中東北部主要侵略者爲日本，北部則獨受俄人窺伺，西部西藏地區英人侵略已久。認爲俄人自日俄戰爭失敗後政略改變，全在「連好歐洲，以買列強之歡心；進取東亞，以襲捲土重來之舊計。」英人侵我以通商爲要務，非如俄日之於蒙滿以武力爲手段，因此日俄係我國目的敵，而且兩國互相勾結，合力謀我，我國國勢不堪設想。在此形勢下，我國理當以全力對抗日俄，惜因國力未逮，無此可能，勢不能不有輕重之別，大小之分。而今俄之國力不如日本，又面臨內亂之危機。故如採取攻勢國防，當取陸主而海從，東守而西攻，何況我之海軍一時不易建設，陸軍實力強於海軍。進而蔣先生分析地理、經濟及人口與軍政軍備的關係，認爲我居於優越之形勢，惜我將校程度低落，使軍隊如盜群，其本身如盜魁，不特不能建設民國，而反以速亡。故當務之急，在我將校痛加反省（註一〇）。

在蒙藏問題之根本解決一文中，蔣先生認爲蒙藏的背叛，係英俄暗中煽動所致，「內之足以障礙民國之進行，擾亂共和之秩序，外之足以引起列強之野心，釀成中國之瓜分。」故必須迅速敉平。但由於英俄日三國的勾結阻撓，以及我國政府的軟弱，致而遷延至今。今日西藏問題既已允與英人修改前約，遽難失信，而況由中國本部各省至藏，道路險阻漫長，川滇軍又不及北洋軍，在戰術上征藏亦難操勝算，實不如對英用撫，戮力征蒙，專志敵俄，以收擊虎驚犬，平北收西之效（註一一）。

在巴爾幹戰局影響於中國與列國之外交一文中，蔣先生認定英俄有根本上的矛盾，其如巴爾幹半島的天然糾葛，萬

難消除。因的利波利之權利而引起的意土戰爭，勢必使協約國與同盟國關係而更複雜，英國由於本身回教徒殖民地問題與素來同情土耳其的態度，再加以與俄國的矛盾，可能左袒奧意，反對俄法，將因此而促使三國之同盟益堅，三國之協約反而漸疏，勢將構成俄奧戰爭導火線，抑且必為英俄衝突之引電機。在此情況下，我國理應利用時機，適時聯絡與巴爾幹無利害關係之美國，及與俄國有利害衝突之英德意諸國，俾能於東方牽制俄國，使其不敢東顧，併吞蒙古。日本將因此亦不敢單獨採取侵略行動（註一二）。

綜括上述蔣先生在民國元年所著各文，可以看出，他洞察俄人對我之侵略，認為是東亞動亂之源，我國最主要的敵人之一。於俄人趁我辛亥革命民國初建之際，唆使蒙古獨立，衷心感到情勢嚴重，深盼能假借俄國國勢衰落，內亂頻仍，對外有事於歐洲及近東的時機，利用外交與武力，在東北及蒙古，收回部份已喪失的權益，甚至迫使蒙古，取銷獨立，重新隸屬中國版圖。因此我們可以說，蔣先生對俄國的侵略，是深有戒心的；對俄國在遠東的任何行動，是極為注意的！

三、歐戰後的渴望了解蘇俄及共產主義

蔣先生何時注意及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問題，由於現存的史料不足，難於確知。唯根據當時的情況判斷，極有可能，在其留學日本期間，由於當時日本及中國在日留學生刊物與同盟會的民報常載有介紹此類思想的文字，他應已具有若干知識。唯可確定者，似未曾深加研究。此後由於從事革命的實際活動，奔波各地，自無暇及此。迨俄國發生革命，蔣先生對共產主義及蘇俄的注意力，遂乃逐漸增加。曾一度認為：「俄國革命在近代革命歷史上，開闢了一個新紀元。」為了確切認識蘇俄及共產主義，有意赴俄實地考察（註一三）。民國八年七月廿五日蘇俄代理外長加拉罕 (Lao Karakhan) 發表對華宣言，宣佈放棄帝俄在華特權，一般中國知識份子大為興奮，不自覺均為加氏宣言所惑。蔣先生對蘇俄及共產主義渴求切實認識之心，更為增加。曾於是年十一月初撰世界各國政府對付俄國勞農政府的手段如何一文，發表於星期評論（註一四）。暇時並閱讀俄國革命記，亦學習俄文，準備俟有機會，能夠赴俄觀察（註一五）。此時蔣先生有意赴歐洲留學，其主要目標為德國。蓋歐戰後德國馬克貶值，國人前往留學較為便宜，而德國學術又居世界前茅，國人對之

印象素佳，故一時留德之風盛行。蔣先生既注重軍事，德國陸軍與兵學斐聲國際，故在社會風尚、實際需要及經濟條件三因素下，決意赴德讀書，由德則可短期赴俄。當時國人留學，有不拘於一國的看法，而蔣先生的計劃是赴歐美三年，以充實學識（註一六）。故雖以德國為主要目標，絕無完全限定於一國的想法。

由於蔣先生此時有赴俄確切了解蘇俄及共產主義的想法，並學習俄文，故民九年九月下旬，國父在滬電話相招，有意派往游俄。時孫先生對蔣先生的安排是：一、游俄，二、赴四川，三、回粵。蔣先生因游俄同行者非所素契，故決定暫緩其行。有意往四川，但因廖仲愷的力邀，仍決定回粵，以伸公務，而絀私情（註一七）。

蔣先生當時雖未能立即游俄，但根據民十八年四月廿五日他在長沙市民歡迎大會上的演講，可以了解他仍是渴望認識蘇俄及共產主義的。而且由於當時列強多為其自身在華侵略所得的利益，支持北洋政府，反對國父孫中山先生打倒軍閥及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唯獨蘇俄突然向華示好，宣稱放棄一切在華特權，儘管此是一笑臉攻勢，然而蔣先生基於民族主義的思想，國民革命的實際需要，以及中俄均受列強壓迫的相似處境，與共同以打倒帝國主義為政治目標諸因素，略有同情之心。甚至亦因此而產生，如蘇俄及共產主義不妨礙中國國民革命，未始不可以聯絡之的想法（註一八）。要而言之，此時蔣先生對蘇俄及共產主義的看法，頗與國父相同。此後於民十一年陳炯明叛變時，蔣先生曾就他對革命與蘇俄的看法，與國父深談。國父允准蔣先生照預定計劃訪俄。在民十八年四月廿五日長沙市民歡迎大會上蔣先生回憶其事說：

「十一年陳炯明叛變，我赴難到粵，後來在由粵到港的船中，和我們總理深談了一夜。總理也說中國革命許多地方須借鏡於俄國，准許我照預定計畫前往蘇俄，切實聯絡。後來陳逆雖然竄逃，廣州雖然克復，而楊希閔劉震寰飛揚跋扈，日益囂張。當時革命環境惡劣萬分，我更覺得中國革命若不改弦更張，另闢出路，決不容易成功。於是擺脫一切，決心赴俄。」（註一九）

由此可知，日後民十二年秋蔣先生的訪俄，實決定於民十一年八月初蔣先生陪同國父乘英艦由粵赴港時。故孫先生返抵上海後，即於八月廿五日晤蘇俄代表越飛之代表，使國父與蘇俄的關係及蔣先生訪俄一事，有進一步發展。是年十一月下旬，孫先生致書蔣先生曾說：

「兄前有志西圖，我近日在滬已代兄行之矣。現已大得要領。然其中情形之複雜，事件之麻煩，恐較福州情形，當過百十倍。此無怪吾國之志士乘興而往彼都者，悉皆敗興而返。吾幸而得彼津梁，從此可日為接近。」（註二〇）

唯孫先生此時的看法，認定與蘇俄相交，必須自己有相當力量與憑藉，因此力勸蔣先生排除萬難，留於福州，俾可回粵討陳炯明，建立穩固之國民革命根據地。在上引信中亦說：

「然根本之辦法，必在吾人稍有憑藉，乃能有所措施。若毫無所藉，則雖如吾國之青年共產黨，與彼主義完全相同矣，亦奚能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勸共產黨之加入國民黨者，職是故也。此可知非先得憑藉不可。欲得憑藉，則非恢復廣東不可。此次廣東一復，則西南必可統一。如是便可以西南數省為我憑藉，則大有辦法矣。此次土耳其革命黨之成功者，此也。故兄前志之成否，則全在福州之一著也。能即進而滅廣州之賊固善，如其不能，則保有福州而堅持，亦為一進步也。蓋有一日福州，則我有一日之憑藉，外交內應皆可以此為背景。倘並此而無之，則我不過為一租界之亡命客耳，奚足輕重。故兄能代我在軍中多持一日，則我之信用可加多一日。故望兄為我而留，萬勿以無進步而去。」（註二一）

爲了執行國父的這一主張，蔣先生於十二月間返閩（註二二），因而於民十一年內未能成行赴俄攷察。次年（民十二年）四月間又赴廣州就大本營參謀長，亦有所稽延（註二三）。直至七月因在大元帥行營參謀長任內，招人排擠，怨忌交集，憤而辭職，並決心赴俄攷察。在七月十三日致楊庶堪信中稱：

「今與兄等約言，如不允我赴俄，則弟只有消極獨善，以求自全。如能於下月准我赴俄攷察，或反有益。如季新或仲愷二兄中之一人，與我同行，則用代表名義亦可。以弟一人處置外交，必多不妥，或且有錯誤之事，故於名義上不能不略事慎重耳。」（註二十四）

而恰於此時，國父有意籌組一代表團，赴俄報聘，故遂命蔣先生在上海與蘇俄代表馬林（Maring，原名H. Sneeviet）、張繼、汪精衛、林業明等相晤，籌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俄，並攷察其政治軍事及黨務（註二十五）。

四、赴俄考察與對蘇俄及共產主義之認識

蔣先生於民十二年八月十六日，率沈定一、王登雲、張太雷（又名春木，爲華籍國際共產黨員）等，由上海乘日輪神田丸號至大連，然後改搭火車經東三省及西伯利亞，於九月二日抵莫斯科。於是年十一月廿九日啓程返國，在俄停留共二個月又廿八日。除莫斯科外，曾往彼得格勒（Petrograd）訪問六日。所晤蘇俄官員，計有：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長翟趣林（Georgi Wassiljewitsch Tschitscherin）、蘇俄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局秘書羅素達克（Jan E. Rudzutak）、共產國際東方局長胡定康（Gregori N. Voitinsky，或譯作胡定斯基）、陸軍部次長司克亮斯克（E. M. Skljanskiy）、參謀總長加密熱夫（Sergej S. Kamenev）、教練總監彼得祿夫斯克（Petrovskij）、共產國際駐華代表馬林、蘇俄人民委員會主席魯攷夫基（A. I. Rykov）、蘇俄中央委員撒壳尼壳夫（Sokolnikov）、越飛、蘇俄外交部東方司長獨霍夫斯基（Dukhovsky）、鮑羅庭夫人（Mrs. Micheal Borodin）、蘇維埃議長加里寧（M. I. Kalinin）、蘇俄人民教育委員長魯那哈斯基（A. V. Lunacarskij）、托洛斯基（Leo Trotsky）等。而蘇俄最主要領袖列寧（V. I. Lenin）由於病危，未能得見（註二六）。此時蘇俄正是托洛斯基與史達林（I. V. Stalin）兩派互爭權力時期，蔣先生雖未會晤時任蘇俄共黨總書記史達林（註二七），但會晤及與史達林同在中央委員會秘書處工作之羅素達克（註二八），可以說兩派權力人物均已見及。

由國父致加拉罕密函中，可知蔣先生所率之訪問團，其任務除前述報聘及考察蘇俄政軍及黨務外，尚在：與蘇俄商討協助中國革命所當採行之方法與途徑，特別是與蘇俄軍方討論在北京西北地區進攻之可行性（註二九）。蓋國父自歐戰末期欲聯德起，始終有由西北地區進攻北京的構想（三〇）。

由於上述的訪問團任務，再加以蔣先生曾是大元帥行營參謀長，故蘇俄政府係以軍事訪問團視之，特別注重其軍事意義（註三一）。致而在俄方安排下，蔣先生訪問團所參觀的蘇俄在莫斯科及彼得堡各項設施，亦以軍事爲多，而其與蘇俄政府官員的商談，亦以與軍方者最爲重要。

就所參觀蘇俄政軍各項設施及參加各項活動言，根據毛思誠所著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書記載，計有：九月十七日步兵一四四團，認爲優點在全國上下親愛，團長專任軍事指揮，政治及智識事務與精神講話，則由黨代表任之

，權責甚明。九月十九日步兵第二學校。廿日軍用化學學校，研究毒氣使用及防禦方法。廿二日高級射擊學校及十五世紀以來各式槍械數百種，認為俄武器研究及進步與歐美各國相競。廿四日乘飛艇。廿五日試乘旅行飛機，認為較昨乘軍用機為穩。廿六日抵彼得格勒，參觀冬館及館中新立之歷史館。認為其革命黨過去偉蹟血狀怵目悚魂。廿七日海軍大學、海軍學校、海軍機器學校。廿八日海軍博物館、海軍印刷廠、港口、製造潛艇機器及電氣工廠，認為潛艇所用電氣耗經費甚大。廿九日至壳倫司太篤港參觀摩拉搭戰艦、練習艦、魚雷艇及第二號潛艇。十月二日返抵莫斯科，認為彼得堡市況蕭條，民氣頹喪，海軍人員神態不良。深為蘇俄憂。六日參觀展覽會共產黨歷史部門。八日大戲院觀劇，認為先由教育總長登台導楔，台上印刷機隨即發佈宣傳品，是共黨國家特色。廿九日參觀電燈泡製造廠及發電廠，注意其工人俱樂部及學科、手工、音樂補習室、販賣合作社、圖書室、閱報室、膳堂及戲館等員工教育、福利及娛樂設施，與共黨黨部主政。卅日莫斯科西鄉太太兒等處農村，認為村蘇維埃如浙鄉之鄉自治會。十一月一日參觀中央執行委員會，聽衛生總長報告。六日在紅場參觀蘇維埃革命紀念會，聽加密熱夫等人演說。七日在紅場參觀蘇維埃共和國革命六周年紀念之二萬人閱兵。十九日列席莫斯科蘇維埃大會，旁聽一年來政治報告。廿五日參加共黨第三國際會議，並致答詞，促特別注意促進東方革命，及中國國民黨以三民主義為革命標幟，認為第三國際對中國實際情況，不甚了解，頗多隔膜之處。

(註三一)

就與蘇俄黨政軍要員的商談言，中文資料記載不夠詳細，茲根據 Dieter Heinzig 所著「國民黨的蘇俄軍事顧問」，一九二三—一九二七」(Sowjetische Militärberater bei der Kuominlang 1923-1927, Baden-Baden 1978) 一書中間接所引用蘇俄巴蘭諾夫斯基記錄 (Baranovskij-Protokolle)，可知在九月間（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書作九月七日上午）蔣先生訪晤政治局秘書羅素達克（毛書作共產黨秘書長），請講述蘇俄革命史，俾作為國民黨將來制訂政策之參攷。羅素達克除對代表團之前來表示歡迎外，認為代表團的前來已使雙方關係邁開一大步。然後以長達兩小時的時間，講述俄國革命、蘇共國家政策、工業化及紅軍建立情形。旋建議由中國代表團代表及共產國際合組一特別委員會，負責將來國民黨與蘇俄共黨間的合作事務，並希望國民黨派遣代表，常駐莫斯科。蔣先生對此表示贊同。(註三三)。

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書中，對此次會晤也有記載，唯重點不同，道出蔣先生對俄國革命及共產制

度的批評：「聽談革命史況，約二小時餘。公記其革命成功三點：一、工人知革命之必要，二、農人要求共產，三、准俄國一百五十民族自治，組成聯邦制度。而其缺點亦有三：一、工廠充公後無人管理，二、小工廠盡歸國有，集中主義過甚，三、利益分配困難。又記：現在建設情形：「兒童教育嚴密，二、工人皆受軍隊教育，三、小工廠租給私人。」（註三四）

另根據 蔣總統秘錄，可知當時蔣先生對蘇俄及其極權共產制度的認識是：極權共產的經濟政策有重大的缺失，不如自

為一九二一年以後改行新經濟政策，恢復自由市場，逐漸開放個人經營，方始經濟略見復甦（註三五）。綜括上述的三項資料，可知蔣先生對蘇俄及其極權共產制度的認識是：極權共產的經濟政策有重大的缺失，不如自由經濟，但政治上的聯邦制與注重農工利益，有其成功處。由於當時的需要俄援，雙方可共組特別委員會，與派遣代表駐俄，俾有益於合作。

九月九日蔣先生曾率代表團拜晤蘇俄陸軍部次長司克亮斯克及參謀總長加密熱夫，是一項極為重要的會談。巴蘭諾夫斯基第二項記錄稱：蔣先生在會談中提出三項要求：

- (一) 代表團希望蘇俄儘可能多派軍事顧問赴廣州，俾有益於訓練軍隊。
- (二) 代表團希望蘇俄軍方允許代表與紅軍多作接觸，了解紅軍實況。
- (三) 代表團請求共同研討中國的作戰計劃。

對於第二項，司克亮斯克完全同意，並表示蘇俄高級軍校校長彼得洛夫斯基 (Petrovskij) 將介紹代表團有興趣之紅軍各項設施及活動（註三六）。關於此點，毛思誠在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書中，記載九月十一日蔣先生往訪教練總監彼得祿夫斯克（與前言之高級軍校校長似應為同一人），知俄國軍隊組織之內容，每團部由黨派一政治委員常住，參與主要任務。命令經其署名，方能生效。黨員之為將領及士兵者，皆組有團體，在其團部活動為主幹。凡遇有困難勤務，必由其黨首負責躬先之（註三七）。以及日後參觀步兵一四四團及各種軍事學校及軍事設施，顯然皆是與此次會談有關。

對於第一項多派軍事顧問赴廣州，司克亮斯克等態度頗有保留。表示須待現已在廣州之蘇俄軍事顧問有關其經驗之報告抵達後，方能決定。認為由於學習華語困難，蘇俄軍方無足夠之此方面人才。最好的辦法是在俄成立特別為中國而

設的軍事學校，如同現設的共產黨大學，華方派人前來就讀。該記錄稱，蔣先生對此同意（註三八）。唯由日後國民革命軍幹部全來自黃埔軍校一事觀之，似此事日後有所改變。極有可能蔣先生當時內心中亦未真正贊同。蓋華方派員赴俄接受訓練，與蘇俄軍事顧問來華訓練軍事幹部，在意義上完全不同。在俄接受訓練，除軍事外，必將有政治及思想課程，會強烈受蘇俄影響，成爲親蘇俄者，甚至共產黨徒，對國民革命軍影響至深。而在廣州用蘇俄軍事顧問，則無此弊端。由此亦可看出蘇俄的意圖所在。

對於第三項，司克亮斯克等提出若干關於廣州軍事情況的問題，蔣先生曾對國父中山先生在廣州的困境：兵力不足，地方軍人的不可信賴，士兵鬥志不高，列強特別是英美的敵視，以及軍械仰仗進口接濟，進口又受香港阻撓，列強唆使鄰省軍閥牽制北伐的情況，有所敘述。並表示因此國民黨及其軍事參謀部門，有所決定，擬將軍事行動改由中國西北地區進行。此爲代表團訪俄的主要目的，希望與蘇俄軍方研討此一新軍事計畫的雙方合作可行性。此外蔣先生亦解釋此一新軍事行動的主要敵人爲吳佩孚與曹錕，而孫先生的計畫是：

(一)利用在陝西的游擊隊，即民十一年爲吳佩孚所擊潰的各軍，再加以南方增援的軍隊，在陝西建立反吳佩孚軍事根據地。

(二)在華北與蒙古庫倫以南之邊界地帶，仿照紅軍辦法，建立新軍。

(三)利用游擊隊，破壞鐵路，並以宣傳攻勢喚醒農工階層及部份吳佩孚屬下，起而反吳。

蘇俄軍方對此計畫，態度甚爲遲疑，僅要求華方應提出詳細的文字說明。特別是可運用的軍隊數量，新軍事行動地區的政治情況，應多加說明（註三九）。至於日後蔣先生代表團是否提出此一補充文字，巴蘭諾夫斯基記錄中，並未有所交代。但毛思誠書中作九月十三日在賓館擬代表團意見書八千二百餘言：甲、緒論，乙、軍事計畫，丙、宣傳計畫，丁、結論。似於十月六日送蘇俄軍務部及外交部，並於廿五日致函司克亮斯克（註四〇）。故雙方復有十一月十一日的第二次會談。

此次會談參加者俄方仍爲司克亮斯克及加密熱夫，代表團方面，除蔣先生、王登雲及張太雷三人外，尚有邵元冲。邵氏係由西歐奉國父之命於十一月初抵莫斯科，參加代表團。此次會談記錄載於巴蘭諾夫斯基記錄，亦即該記錄第三項

文件。據該記錄稱：蘇俄軍方對華方的西北地區軍事行動計畫，完全加以拒絕。認為「根據俄國的革命經驗，國民黨應盡全力於政治方面，否則在現有的情況下，任何軍事行動均將注定失敗。……所以首要之務在於宣傳工作。……此時不忘軍事行動，固然亦甚正確，唯大規模軍事行動，須在偉大的政治工作完成之後。」而且蘇俄軍方以為透過宣傳工作，可爭取敵人後方的廣大群衆。予以武裝，可為己用。使革命的軍事行動，易於達成。更應倣效蘇俄的先例，在所謂無產階級領導下，完成一切的準備工作（註四一）。

由此可以看出，蘇俄企圖與陰謀是與國父及蔣先生的構想南轔北轍的。國父及蔣先生是希望先以最有效的軍事行動，打倒軍閥及帝國主義，統一中國，然後實行三民主義的建設，使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途徑。而蘇俄則加反對，企圖借援助之名，先行政治分化，使國民黨變為所謂無產階級領導，亦即成為共產黨，而後再軍事行動。此即是日後國父去世後蘇俄顧問鮑羅庭與共黨在廣東所進行陰謀的張本。蔣先生此時已洞識其陰謀所在，故在此次會談中答稱：中蘇兩國情形不同，在俄國當時僅有沙皇政府的壓迫，一切較易；在中國則因受全球的帝國主義侵略與壓迫，革命工作甚為困難。中國敵後政治工作祇宜在工業中心地區進行，但由於受阻於帝國主義及軍閥的秘密警察，難於見功。而且根據孫中山先生與越飛的宣言，同時的軍事努力是被認為必須的。但司克亮斯克爭辯稱：在十月革命以前，蘇俄革命亦受帝國主義壓迫。並堅決表示，中國如想達成其革命，必須結合群衆，與群衆合作無間（註四二）。此處所謂的群衆，顯然是指所謂的無產階級。巴蘭諾夫斯基記錄之文件曾逐字記錄司克亮斯克堅決的言詞說：

「在未來數年中，必須僅從事政治方面工作。祇有內部條件成熟後，才可採取軍事行動。如像現在所擬定的軍事行動，那是一種冒險，一開始即已注定其失敗的命運。」（註四三）

司克亮斯克為緩和當時會談的緊張氣氛，亦曾表示，可以同時進行軍事的準備工作。但蘇俄軍方認為軍事幹部應在俄訓練。蘇俄參謀學校每期可接受三至七名，軍事學校每期三十至四十名中國軍官前來受訓。但所派者必須精選，而且必須黨性堅強，資格不得低於營、團長，同時應先受預備訓練。由於須獻身革命及工人階級，此項選派不在量的衆多，而在素質的精美。對革命認識不清，怯懦者，賣國者，不可選派。蔣先生曾再度詢問，可否多派人員來廣州，在加拉罕與孫先生之代表所商定開辦的各學校工作。司克亮斯克仍表示須視現按規定受訓之五十人成果再定。如結果良好，蘇俄

軍方不予以反對（註四四）。

由十一月十一日蔣先生等與蘇俄軍方第二次的晤談，我們可以看出：蘇俄當時援助的目的，並非真正在幫助中國的國民革命，而是要借此多培育親蘇，甚至共黨的軍事幹部，並分化國民黨，使之成為共產黨，以遂其赤化中國的野心。故堅持先行作政治方面的活動，使無產階級領導一切，反對國父在西北另闢新戰場的計畫，亦反對多派蘇俄軍事顧問來華，堅主在蘇俄訓練中國軍事幹部。此外，此時蘇俄已決心赤化外蒙，可能亦有意與馮玉祥建立關係，故於國父欲在西北與蒙邊建立新軍事根據地，感到威脅。這一切自難逃蔣先生的洞察。故在回國後的報告書中，坦率陳述其對蘇俄與共黨的不安的看法，民十三年元月十六日在廣州晉見孫先生時，更有口頭的詳細補充說明（註四五）。孫先生因當時俄援的需要，認為：「未免顧慮過甚。」此後蔣先生在致廖仲愷函中亦曾明白說：

「尙有一言欲直告於兄者，即對俄黨問題是也。對此問題應有事實與主義之別。吾人不能應（因）其主義之可信，而乃置事實於不顧。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弟對兄言，俄人之言祇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也。……俄黨對中國之惟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對中國之政策，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

（註四六）

為使中國國民黨常務委員會委員了解俄共的野心可慮，蔣先生亦曾將此函公開抄致（註四七）。此外民十八年四月廿五日對長沙市民的講演中，亦說：

「到俄考察的結果，令我以前對於共產黨革命的一切希望，全歸泡影。就是考察以後覺得共產黨所號召的目的，以共產黨的方法，決不能達到。所以俄國共產革命決不能算是成功。即使退一步說，他們的革命可算成功，然而決不能適用於中國。所以回國以後，對於共產黨加入本黨的問題，曾對總理表示異議。這是很多同志所知道。」

（註四八）

在民四十五年所著蘇俄在中國一書中亦曾說：「綜括我在俄三個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無形之中，發生一種感覺，就是俄共政權如一旦臻於強固時，其帝俄沙皇時代的政治野心之復活，並非不可能。則其對於我們中華民國和國民革

命的後患，將不堪設想。」（註四九）

蔣先生兩次與蘇俄軍事首腦人物陸軍部次長司克亮斯克及參謀總長加密熱夫的會談，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書中，記載均甚簡略。僅稱：「（九月九日）下午訪陸軍部次長司克亮斯克，研討中國現勢，又會參謀總長加密熱夫。」（註五〇）「（十一月）十一日會司克亮斯克及加密熱夫。」（註五一）唯值得注意者，九月九日的會談，根據毛著，係與司克亮斯克及加密熱夫分別進行者。而 Dieter Heinze 書中所間接引用之巴蘭諾夫斯基記錄，則作同時會晤，兩者何書有誤，則無法加以判定。

根據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書，蔣先生與蘇俄政要所舉行的重要會談，尚有：

(一)十月廿一日下午往齊采林（即翟趣林），談蒙古問題，無結果而散（註五二）。故蔣先生於廿六日特致函齊采林，作補充說明稱：

「那天你說蒙古人怕中國人這句話，要知道蒙古人所怕的是現在中國北京政府的軍閥，決不是怕主張民族主義的國民黨。蒙古人惟有其怕的心理，所以急急要求離開怕的環境。這種動作，在國民黨正想快把他能從自治的途徑上，達到相互間親愛協作底目的。如果蘇俄有誠意，即應該使蒙古人免除怕的狀況。須知國民黨所主張的民族主義，不是說各個民族分立，乃是主張在民族精神上，做到相互間親愛的協作。所以西北問題，正是包括國民黨要做的工作的真意，使他們在實際解除歷史上所遺傳籠統的怕。」（註五三）

(二)十一月廿一日拜晤人民教育委員長魯那哈斯基，瞭解蘇俄之教育方針：「統一教育制，二、多辦專門學校，三、接近實際生活，四、注重勞工學校，五、廢除宗教，六、男女同學，七、學生管理校務，常年教育經費中央與地方合計為百分之十四，統計為一萬四千萬元，尚不足預算三分之一（註五四）。

此兩項 Dieter Heinze 書中均未提及。極有可能巴蘭諾夫斯基記錄注重於軍事方面。但不可否認，蔣先生與齊采林有關蒙古問題的晤談亦甚重要，可能是蔣先生代表團所要瞭解的重要問題之一。至少蔣先生基於民族主義的立場，對蘇俄赤化蒙古的陰謀，深感不滿。故希望俄人表明態度，對此有所澄清。所以於十一月十九日再致書托爾斯基（應即為托洛斯基），特別表示：「關於華人懷疑俄國侵略蒙古一點，務望注意避免。」（註五五）

此外，最值得注意者是：張太雷在蔣先生與俄方軍政要員晤談時所發生的影響作用，蓋張氏是會談時的翻譯，又是國際共黨黨員。根據巴蘭諾夫斯基記錄旁注，在蔣先生與蘇俄軍方會談後，蘇俄政府曾私下召見張太雷，密詢代表團對各事的態度，並稱張氏的態度對俄影響甚大（註五六）。可知蘇俄政府是利用張太雷，希望儘可能的了解代表團的虛實。蔣先生對此亦深有認識，曾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稱：「訪問團一到俄國，他就施展其分化工作，把沈定一誘到他一邊，與我們對立起來。」（註五六）Dieter Heinzig 在他的書中，亦認為蔣先生為防範張太雷，將對俄的真正態度有所隱藏（註五八）。

蔣先生在俄亦曾與中國留學生及越南「革命」份子阮愛國（可能即日後之胡志明）有所接觸。根據毛思誠的記載，曾於七月十九日在賓館接見中國留學生，次日亦應中國共產黨青年團之邀，赴其歡迎會。十月三日會晤阮愛國，十月十日晚在賓館與全體中國同學舉行雙十節慶祝會，並講述革命黨與國父之歷史，於國父之偉大，極為推崇。越日因有人訾其演說為有個人崇拜之弊，蔣先生深為中國青年的妄自尊大，願受外人支配，不知尊重祖國領袖，有所憂懼（註五九）。認為中國共產黨已成俄奴。（註六〇）

至於蔣先生對所會晤的俄國諸人印象，他認為蘇維埃議長加利寧，是一誠篤的農民，於國外大勢不甚瞭解（註六一）。參謀總長加密熱夫及外長齊采林對孫中山先生有敬重之心，對中國國民革命願誠意合作（註六二）。李諾維也夫（G. E. Zinovev）、拉迪克（K. B. Radek）與越飛比較關切國民黨與俄共的合作，但越飛返俄後業已失勢（註六三）。而其他敬重孫中山先生及願誠意與國民黨合作者，多為猶太人（註六四）。蔣先生印象最好者，為托洛斯基，而且與彼相談最多。認為托洛斯基言行最為爽直。曾在離莫斯科以前，最後告別的拜訪中，托氏與蔣先生談起亞洲各國革命問題，提到日本、越南、印度與土耳其。亦言及托氏在德國與波蘭革命失敗的經過，並加以分析。然後再談到援助中國國民革命問題，並託回國後口頭報告孫先生，蘇俄自一九二〇年對波蘭戰爭結束後，列寧對世界革命政策，有新的指示，即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反資本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爭，應在道義與物質上予以儘量援助，但不復使用其正式軍隊直接參戰，以避免在各國革命時期，對蘇俄引起民族有關的問題。並鄭重地說：蘇俄對中國國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軍隊直接援助外，其他武器與經濟等需要，都當盡其所能積極援助（註六五）。最後並致臨別贈言說：革命之要素：忍耐與活動，二者

不可缺一（註六六）。

蔣先生雖對托洛斯基印象甚佳，唯他在訪俄期間，已注意到當時列寧病重，俄共內部托洛斯基的國際派與史達林的國內派暗鬥激烈，一旦列寧去世，對中俄合作關係，將發生嚴重影響（註六七）。

至於蘇俄方面對蔣先生及其代表團的印象，就整體言，是歡迎代表團及蔣先生的訪俄，故接待均極熱烈隆重。對蔣先生是孫中山先生的重要親信之一，特別在軍事方面，甚至可以說，是唯一的。故一再拉攏蔣先生，盼加入國際共產黨（註六八）。但由於蔣先生的拒絕，再加以忠誠嚴正的信仰三民主義的態度，強烈的國家民族思想，亦使蘇俄相當不安。不僅在軍事方面的談判，堅持政治先於軍事，要以所謂的無產階級的領導為第一要義，甚至共產國際亦於蔣先生臨行前一日（十一月廿八日）以包含八項的「關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國民黨」重要決議，批評國民黨及蔣先生，認為國民革命之所以迄今未能得到成功，在於未曾注意及勞動大眾及農民與城市市民的階級利益，使其投入革命。故中國國民黨的國民革命必須澈底的改變其方針，完全走蘇俄共黨的路線。而且整個文字中，用十分嚴厲的口吻，幾乎全是用命令與必須的字樣（註六九）。因此蔣先生閱及後，深為憤怒，怫然說：「吁！觀其論調，不認識友黨如此，應愧自居為世界革命之中心。前晤其領袖徐（季）維諾夫，殊無振奮氣象，外強中乾，其成功蓋可知已！」（註七〇）

五、結論

綜括上述，可以瞭解蔣先生民十二年的訪俄，實使其對蘇俄侵略的本質，共產制度的缺失，以及蘇俄與共產國際分化國民黨，赤化中國的陰謀，皆有決定性的認識。故返國後無論在報告書中，或口頭稟陳中，均對聯俄容共一事提出隱憂以及當予嚴密防範的看法。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他曾明白的說：「在我未往蘇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對我們國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誠。而絕無私心惡意的。但是我一到蘇俄攷察的結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斷定了本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地主義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是危險。」（註七一）在民十八年對長沙市民的講演中，亦說他對蘇俄及共黨的認識，可以分為兩個時期，從蘇俄革命到赴俄訪問時，為第一個時期，此時期的看法

是同情。而赴俄以後則爲第二個時期，看法是失望與反對。並認定蘇俄及共產主義的革命是以恨爲動機，革命的性質是階級的，革命的方法是注重階級鬥爭與奪取民衆武裝暴動。皆與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不同，不適合於中國（註七二）。這是他何以要反共。一個服膺三民主義，注重國家民族利益的愛國者，是無法容忍蘇俄的侵略與共黨的赤化中國的。

註釋

- 註一：C. Martin Wilbur, *Sun Yat-sen and Soviet Russia, 1922-1924*, p. 1；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台北商務，民六十一年，第11版，頁一九三。
- 註二：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頁一九四至一九五。
- 註三：同上書，頁一九五至二一一。
- 註四：中國南部蘇聯軍事政治工作組織大綱，第一章宗旨，第三條，載於黨史會編，革命文獻第十五輯，附錄，頁一，即總頁次二五七五。
- 註五：民十二年一月廿八日上海民信日刊第二版，轉引自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頁一四五。
- 註六：三民主義，民生主義第一講與第二講，國父全集，黨史會本，民六十二年，第一冊，頁一五七至一八〇。
- 註七：蔣中正，自反錄，卷五，序跋類，頁廿四上至廿六下，軍聲發刊詞民元年；陸培湧，蔣中正先生的早期民族思想，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集，民七十五年，第一冊，頁二四五。
- 註八：蔣中正，自反錄，卷一，戰略類，頁二下至三上。
- 註九：同上書，卷一，戰略類，頁五。
- 註一〇：同上書，卷五，論說類，頁一上至十六上。
- 註一一：同上書，卷五，論說類，頁廿三上至廿九下。
- 註一二：同上書，卷五，論說類，頁卅上至卅四下。
- 註一三：蔣中正，本黨國民革命與俄國共產革命的區別，民十八年四月廿五日出席長沙市民歡迎大會講演，載於先總統蔣公思想論總集，卷十，頁三八九。
- 註一四：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二冊，頁八十七上，第六編，韜養時期。
- 註一五：同上書，第二冊，頁八十九下至九十上，第六編，韜養時期。

註一六：同上書，第二冊，頁八十五上，第六編餉養時期。

註一七：同上書，第三冊，頁九下，第六編餉養時期。

註一八：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十，頁三九〇。

註一九：蔣中正，自反錄，第二集，頁一五二九，民廿年刊。轉引自王聿均，蔣中正先生訪俄及其觀察，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討論集，民七十五年，第二冊，頁五八。按本文亦見於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十，頁三九〇，唯兩者內容略有出入，似思想言論總集所載略有遺漏。

註二〇：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四冊，頁五十七下至五十八上，第六編餉養時期。另根據俄文資料，是年十一月，國父曾致電列寧，將在最近派員赴莫斯科，商談合作。（見 Dieter Heinzig, *Sowjetische Militärberater bei der Kuomintang, 1923-1927, Baden-Baden, 1978, S. 108*）。

註二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四冊，頁五十八上至五十七下，第六編餉養時期。

註二二：按蔣先生獲國父函時，係在啟程離閩於馬尾上輪船時，故未能終止其行。回滬返浙後，於十二月十六日再返閩。旋奉國父命率軍經閩南攻陳炯明。

註二三：民十二年元月十日蔣先生以陳炯明為滇桂軍所敗下野，自閩返滬。故此時再赴粵就中山先生大本營參謀長職。

註二四：蔣中正，自反錄，卷四，書函類二，頁三下至四上。

註二五：毛思誠，民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四十一上，第六編餉養時期；王聿均，蔣中正先生訪俄及其觀感，蔣中

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第二冊，頁五九。

註二六：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第四十八上至七十上；王聿均，蔣中正先生訪俄及其觀感，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第二冊，頁五十九至六十一。

註二七：根據 Dieter Heinzig 在其 *Sowjetische Militärberater bei der Kuomintang 1923-1927, p. 110* 所載，俄方記載，亦有稱蔣先生會晤及史達林。唯根據毛思誠所著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書按曰所記，似不確。故不予採信。

註二八：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書中作共黨秘書長（見該書第五冊，頁四十九上。）

註二九：Albeu S. Whiting, *Soviet Policies in China 1917-1924,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54, p. 243*。按國父此函係寫於民十二年九月十七日，亦即蔣先生抵莫斯科後的半個月。

註三〇：C. Martin Wilbur, *Sun 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76, p. 151-152*, 摘著，德國檔案中有關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幾項記載，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四輯，民國三十一年，頁三一七至四三。

註三一：Dieter Heinzig, *Sowjetische Militärberater bei der Kuomintang, S. 109*.

註四一 .. 蒋總諭，歐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册，頁四十八至四九。

註四二 .. Dietter Heinzig, Sowjetische Militärberater bei der Kuomintang, S. 111-112.

註四三 .. 蒋總諭，歐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册，頁四十九，第六編組養時期。

註四四 .. 蔣總統秘錄，第五册，頁一〇七至一〇八。

註四五 .. Dietter Heinzig, Sowjetische Militärberater bei der Kuomintang, S. 112 .. 吳文津，Divergence in Strategic Planning; Chiang Kai-shek's Mission to Moscow 1923, 蔡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第一册，中文本，頁四三。

註四五 .. 蒋總諭，歐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册，頁五十至五十一。

註四五 .. Dietter Heinzig, Sowjetische Militärberater bei der Kuomintang, S. 113；吳文津 Divergence in Strategic Planning; Chiang Kai-shek's Mission to Moscow 1923, 蔡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第一册，中文本，頁四三。

註四五 .. Dietter Heinzig, 註四五 .. C. Martin Wilbur, Sun 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 p. 152-153；吳文津，

Divergence in Strategic Planning; Chiang Kai-Shek's Mission to Moscow 1923, 蔡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第一册，中文本，頁四三。

註四五 .. 蒋總諭，歐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册，頁四十一至四十二。

註四五 .. Dietter Heinzig, Sowjetische Militärberater bei der Kuomintang, S. 115-116; C. Martin Wilbur, Sun 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 p. 153；吳文津，Divergence in Strategic Planning; Chiang Kai-shek's Mission to Moscow 1923, 蔡中正先生與

现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第一册，中文本，頁四二。

註四五 .. Dietter Heinzig, Sowjetische Militärberater bei der Kuomintang, S. 116-117.

註四五 .. 蒋士書，頁一至二。

註四五 .. 蒋總統秘錄，第五册，頁一一至一一四。

註四五 .. 蒋中正，自反錄，卷二，函類，頁廿七，復廖仲愷，十二年三月十一日。

註四五 .. 蒋總統秘錄，第五册，頁一一四。

註四五 .. 蒋中正，本黨國民革命和俄國共產革命的區別，中華民國十八年四月廿五日出席長沙市民歡迎大會講演，總統蔣公思想回憶總集，卷十，頁三九〇。

註四五 .. 蒋中正，蘇俄在中國，頁一一三。

註五〇 .. 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册，頁十上。

註五一..同上書，第五冊，頁六十五下。

註五二..同上書，第五冊，頁六十上。

註五三..同上書，第五冊，頁六十七下至六十八上。

註四五..同上書，第五冊，頁六十七下至六十八上。

註五五..同上書，第五冊，頁六十七下。

註五六..Dieter Heinzig, *Sowjetische Militärberater bei der Kuomintang*, S. 118-119.

註五七..蔣中正，蘇俄在中國，頁1111。

註五八..Dieter Heinzig, *Sowjetische Militärberater bei der Kuomintang*, S. 119.

註五九..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五十一下至五十二上..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五十九下至五十九上。

註六〇..蔣中正，血反錄，卷三，書函類，頁廿八上，復廖仲愷書，十三年四月十日。

註六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六十六。

註六二..蔣中正，蘇俄在中國，頁1111。

註六三..同上書，頁1111。

註六四..同上書，頁1111。

註六五..同上書，頁1111。

註六六..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中正先生，第五冊，頁六十九。

註六七..蔣中正，蘇俄在中國，頁1111。

註六八..蔣總統秘錄，第五冊，頁1110。

註六九..共產國際的全文未曾得見，此處所記係轉引 Dieter Heinzig, *Sowjetische Militärberater bei der Kuomintang*, S. 121. 關於此事，C. Martin Wilbur, Sun 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 | 書及吳文建 Divergence in Strategic Planning: Chiang Kai-shek's Mission to Moscow | 文中，均提及，唯不及 Heinzig 之書詳細。

註七〇..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六十九下。

註七一..蔣中正，蘇俄在中國，頁1115。

註七二..蔣中正，本黨國民革命和俄國共產革命的區別，中華民國十八年四月廿五日長沙市民歡迎大會講演，先總統蔣公思想論述集，卷十，頁三九〇至三九三。